



茅盾文集

长篇小说

4

《神州儿女》以十年动乱时期的社会生活为背景，真实生动地描写了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工人阶级与林彪、“四人帮”反革命集团进行艰苦斗争的壮丽画卷，表现了工人阶级在斗争中的中流砥柱的伟大作用。

中国青年出版社

草明文集

草明
著

长篇小说

4

中国青年出版社

神 州 儿 女

第一章

陈宝元和周勇挟着赵建中的发明创造的材料,急匆匆地骑车到燕门市委传达室。传达室告诉他们,通过这座办公大楼朝北走,便看见后花园,沿着花园的曲径走到尽头,便是市委常委们开会的地方。

他俩按着指点方向,走完办公大楼楼底,通过北边一道门之后,果真豁然开朗,百年的高大的松柏和老槐树遮天蔽日,十分凉爽。二人深深吸了一口清新的空气,朝前走去。忽然,一个大花坛挡住了去路。花坛的直径有五米长,上面种满各种鲜艳罕见的花。园里铺满绿莹莹的台湾草,人们走路必须绕着半圆的用小石子砌出花纹的小路走,别无他径。陈宝元啧了啧舌头,没有说话,和周勇继续朝前走。走了一段路,还没有看见有会议室,路旁只有一座被刺梅、丁香包围的凉亭。他们正欲往前走,却又被一座假石山挡住了去路。这九弯八曲的小径,竟把二人的急匆匆的劲头煞住了。周勇沉不住气了,嘟哝了一句,说:“这儿莫非是大观园!若是小赵看见,又得提意见了。”

陈宝元也会心地笑笑,加添说:“难为党委机关竟挑选这么个天堂。”

好容易绕过假石山,又走了一段路才看见一道石砌圆门。通过石圆门,里边有个网球场,再朝前望,看见了几所小巧玲珑的办公室。

这二人的感慨不是没有道理的。这个花园本来是解放初期从一个老学究的后代那儿买来的,已荒芜不堪。自从文教书记祝尚礼来此之后,苦心经营,盖了凉亭、石山、水池,又从老家弄来许多奇花异草,并盖了几间精致的办公室和一个小会议厅,便于他的老战友、市委第一书记杨耀祖办公和书记们开会。因为杨耀祖的宿舍就在花园的隔壁,只要通过一道小侧门便可走到办公室来了。因为这所花园搞得有点豪华,曾受到上级的批评,群众对此也很不满。一贯俭朴的杨耀祖哪里敢在这儿办公,无奈大家的规劝,说钱都花了,不用更浪费,他才勉强和祝尚礼等几个书记在这里办公。祝尚礼的住宅在花园的西边,只要另开一道小侧门,便可走到他的办公室了。这个花园既是书记们办公重地,一般干部们轻易不到这儿来,所以十分幽静,只听得见小鸟儿在歌唱。可今天,这里却很不一样。正当陈宝元和周勇沿着幽径往前走的时候,小会议厅里却争论得很热闹,连小鸟儿也侧着脑袋在倾听。原来是国际技术交流会议

邀请我国派代表参加,中国科学技术委员会决定派出一个由科技人员组成的代表团去出席。成员名单已定,科技委员会建议由代表团中的燕门市的代表、青年劳动模范赵建中去作学术报告,所以到燕门市来征求意见。谁知科技委员会党组书记兼副主任宋祥宁一提出,便遭到燕门市文教书记祝尚礼的反对。

祝尚礼身材略嫌肥胖,说话时还带一点台州口音。虽然这儿的人都听惯了,但是他的秘书陆文瀚还有时给他做些翻译和注脚。祝尚礼用食指抖着烟灰,耐心地向大家解释:“同志们须知,赵建中有创造、重实际,好是好,但他连小学都未上过,怎能把实际上升为理论到国际讲坛去讲?你想,面对西方那些大知识分子,他哪里是人家的对手?只有我国在西方留过学的人才对付得了。”

参加这个会的,除市委主持人祝尚礼之外,还有书记兼工业部长王胜等。市委第一书记杨耀祖听说会上有争论,也抽空赶到。他在燕门市从当书记到担任第一书记已有十来年了。他对常委们是熟悉的。常委会里有不同意见是经常有的事。通常,王胜好持相反的意见,祝尚礼却喜欢和稀泥。对待这样的情况,杨耀祖的经验是引导大家把各种意见充分考虑,然后统一思想,作出决定。他思忖宋祥宁提出由赵建中去演讲,显然是上级同意的,他来市委征求意见,不过是一种民主作风罢了。奇怪的是祝尚礼今天坚持反对意见,而且是少数,这是少有的现象。他作难了,只好用他那种特有的活跃的神情和他的不太重的台州口音笑着说:“老宋说得有理,中国工人登上国际科技讲坛,这本身就是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的证明。资本主义国家哪有劳模,哪能让工人劳模去开会?不过我也理解老祝的意思,外国科学家是很重视理论的,他追问你的理论根据,万一工人同志回答不上就砸锅了,是要慎重些。大家再考虑考虑。”

王胜抢着补充道:“哪至于砸锅?赵建中早已晋升为工程师了。理论水平也不低,人家是自学成才的嘛!”

宋祥宁是铁匠出身,三十多年前那柄二十来磅的铁锤把他锻炼成顽强的、勇于斗争的脾性。他身高力大,好打抱不平,群众喜欢他。他刚满徒时已是著名的“宋三锤”了。原因是有一回,他师傅要打一块异型铁模,但是怎么打也不就范,好几个老师傅也摆弄不了。刚出师的宋祥宁笑嘻嘻地走上前去说:“待我来试试。”只见他朝手心吐上唾沫,抡起二十四磅的大铁锤,用眼瞄准了铁模的角度,只打了三锤,那块异型铁模就打出个雏形来了。以后,石板坊一带,“宋三锤”的名字就传开了。更重要的是几十年来党对他的教育和工作的

锻炼,使他变得老练起来。这几年,他到科技委员会工作以来,成天和高级知识分子打交道,他虚心地向他们学习。在反右运动中,有个科学家说了几句牢骚话,有人批评他对社会主义不满,但宋祥宁尊重事实,分清是非,认为拥护社会主义是那位科学家的主要方面。经过思想帮助,没有把他划为右派。那些科学家、技术人员喜欢宋祥宁的坦率和热情,他也喜欢科学家、技术人员的勇于实践、勇于探求真理的精神。他认为不论中国或外国的科技人员,虽然学问有深浅,生活方式有差异,但是,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总该是一致的。他不明白老祝今天为什么反对赵建中去做演讲。他坐着听了半天听不明白,只觉得别扭。于是,他清了一下嗓子,不慌不忙,既沉着又坚定地说:“你们的青年工人工程师赵建中,不是个革新能手吗?他在机械方面有好多创造嘛!同志呀,现在国际上有人封锁我们,又有人卡我们脖子,使我们工业战线陷入严重的困难。但是,通过工人和科技人员的努力,我们还是靠自己的力量继续进行建设。好呀,让工人们自己去讲讲他们的成就吧!不过,我们的技术是落后的,要老实地向人家学。这次出去,有学习人家先进技术的任务。让有丰富实践经验的人出去见识见识吧!至于由谁去演讲好,我赞成我们的团长顾总去讲,青年工人赵建中也去讲讲,这就两全其美啦!”他一口气讲了这些,越讲越有劲,眼睛闪射出光彩,好像新中国的机械工业的灿烂画图就在他眼前似的。后来,他又补充了两句,“至于怕赵建中的讲稿里的数据、科学原理不充分,那好办,让他们团自己去研究起草得啦!代表团里有顾总嘛!”

祝尚礼解释道:“你有所不知,那个革新迷,连小学都未念过,平常意见又古怪得很,专和人抬杠。”

“那倒不要紧,爱迪生还是报童出身哩!我国的华罗庚也没有念完中学嘛!”王胜安慰似的数落着,“何况我们党就是出人才,放牛娃当将军的、当部长的也不少。”

好几个人不住点头,特别听到赵建中的名字,都活跃起来。

有人问道:“啊,是那个革新迷吗?听说他跟机器结了婚?”

“什么,难道女同志还有叫‘机器’的?”

会议厅里忽然轻松起来,有的人笑了,有的人津津有味地说小赵还未满徒就搞高速切削,赶超他师傅的事迹;有人夸赞这个革新迷善于运用辩证法来改进生产技术,能够用普通的钻刀加以改革,克服了坦克的特硬的钢板,他又连续攻克了许多技术难关,加快了工业建设的步子,对国防建设和钻探事业也作出了贡献,还为国家节约了大量外汇……

听着,听着,王胜接过话茬,一口气扼要地说出了赵建中成长中一些动人

的故事。

原来卖水童赵建中十二岁那年，认识了燕门军械厂工人、地下党员陈宝元。陈宝元看见这个卖水童很特别，他的水桶装得特别满，水不洒不漏。问他有什么窍门，那个一脸稚气的长得高高的卖水童把秘密告诉陈宝元。原来他的平底车用的是胶皮轱辘，水桶底下垫了稻草垫圈，水面上还放了块荷叶。这样，水就不爱往外洒了。陈宝元看见这个少年人喜欢动脑子，可又穷得实在可怜，便想办法收了他做徒弟，给他起了个名字叫赵建中。第二年，燕门市就解放了，赵建中被送到学校念书去了。念了三年书，他已十五岁了。为了生活，母亲叫他回厂干活。这时，军械厂已经和几个小厂合并成为燕门机械厂。他回厂时，他的师傅陈宝元已脱产当了车间的支部书记。他又跟周勇师傅学手艺。周勇手艺高，以不出废活著称。他看见这个小徒弟为人机灵，又刻苦努力，便把手艺都教给他，并且放手让他单独去干活。因此，两年工夫，小赵就能独立干许多活，样样够得上标准。陈宝元对他一点也不放松，说，“肚子里还是多点墨水好。”在业余时间，他一直教他学习文化，借给他许多书看，并请一位大学毕业的年青技术员教他数学和一些技术的理论。这个大学生叫李文瑞，是个勤奋用功的人。他认真教赵建中，还常常进行考核。赵建中如饥似渴地拼命学。他很喜欢李文瑞的严格作风，亲热地叫他李老师。谁知李文瑞并不喜欢这个称呼，对他说：“叫我老李吧！”赵建中又改叫他李师傅。他高兴了，说：“抱歉，抱歉，我也当工人师傅啦！当工人最光荣。”从那以后，全车间的人也都叫李文瑞李师傅了。

一九五五年的一天，东北一个切削能手叫“刀具大王”的来燕门推广一刀多刃的新技术，说是能使生产成倍地增长。事也凑巧，他的表演就在燕门机械厂进行。那种一刀三刃的新技术，可以缩短时间，加大走刀量，深受机床工人的欢迎。小赵看傻了眼，看完表演之后，没等上级推广和动员，回到自己的皮带车床上就动手改。谁知装上三刃的刀头，车床不听使唤，吱扭吱扭地响，皮带呼哧呼哧地在喘粗气，活废了。

有些人射出了冷言冷语，说什么“一刀三刃不关皮带车床的事”。

还有人讽刺说，“嗨，刚会迈步就想飞，‘蛤蟆啃天——没见过’！”

十七岁的小赵听了不服气、不甘心。有个留了山羊胡的老工人好心好意地拉着小赵的袖子到自己的床子跟前，说：“小伙子，我就不信什么三头六臂，一刀三刃还没有我的偏刀大翘好使哩！”

小赵看见老师傅和他一样使的是皮带车床，人家的刀头不颤不抖，皮带运转得很均匀，一溜摆着的活儿十分光洁，可就是出活不快。他决心要学山羊胡

董师傅的优点,但还要想办法出活快。

他睡不着觉,吃不下饭了,脑袋瓜里闹腾得慌,有时觉得问题出在快上,有时又觉得问题出在角度上。究竟主要问题是什么?这天夜里,他在床上翻来滚去怎么也睡不着。忽然,他想起了陈师傅借给他一本毛主席的书,里头讲到做事遇到多种困难时要抓住主要的矛盾。他爬了起来,把妈也闹醒了。他说他要回工厂。任母亲怎样地哄劝,他都听不进,摸黑跑到工厂。他在车床上摆弄了半天,也不知道主要矛盾在哪儿。后来他灵机一动,寻思:“师傅的床子不是皮带的,何不在他的床子上比试比试?”

他在师傅的床子上试了半天,额上的汗水滴答地往下淌。试验的结果,活仍然废了,但是床子没有吱扭吱扭地响,径向力正常。他拍了拍卡具,高兴地对它说:“谢谢你,我明白啦!”

“你明白什么?”前面出现了一个壮实的人影,大声问。

小赵吓了一跳,抬头朝前边一望,原来是他的师傅周勇走过来。

周勇也是想利用夜间在皮带车床上先试验一刀三刃,帮助皮带床子解决问题。当他来到车间时,看见徒弟那瘦高的身影,心里一阵热乎乎的,不觉跑上前去,一手搂着他的肩膀,亲热地说:

“好小伙,我猜中了吧,我就知道你半夜三更在这里试验。”

周勇不仅是小赵的师傅,而且是生产小组长、党小组长。他看见这个苦大仇深的小童工,经过学习,阶级觉悟提高了,技术上进步很快,他已经写了入党申请书,周勇心里特别高兴,他已两次向支部书记陈宝元建议,召开支委会,讨论一下小赵的入党问题……

师徒俩流了一夜汗,试验基本成功。第二天,李文瑞自动带着改革皮带车床的草图来时,看见小赵和周师傅都已试验成功了。他也连忙动手改正了两个地方,效果更好。后来又进行了反复试验,使效率提高了两倍。赵建中仿佛在一夜中长高了,长大了。支部书记陈宝元认为,小赵、周勇这一行动,狠狠冲破了某些老工人的保守思想,这比提高效率两倍的意义更要大得多。他趁这个势头表扬了赵建中、周勇的革新精神,来推动全车间的生产和技术革新活动。陈宝元和周勇对群众又做了过细的深入的思想工作。不到两个月,这个落后的皮带车床车间,第一次掀起了技术革新的高潮。李文瑞和赵建中没日没夜地工作,终于叫所有的皮带车床都使上了一刀三刃。小赵在这热火朝天的技术革新运动中,几乎每天都帮助别的机床搞到半夜三更才回家睡觉。大家亲昵地赠送给他一个雅号,叫他“革新迷”。

尝到了改革的甜头,人们的劲头更大了。他们像一队停不住蹄的马群,勇

敢地朝前奔。小赵像是领头的那匹小壮马,被身后的马群紧逼着,只好四蹄离地似的飞腾。这情景,真把那个支部书记陈宝元乐坏了。他和周勇、李文瑞全力以赴地带领全车间职工,利用废旧材料,把全部皮带车床都革新过来,把皮带带扔掉了。

赵建中逐渐成为全厂工人们的有求必应的技术员,并已是全市有名的革新能手了,市里的一些工厂也常请他去解决某些难题。他几乎没有一个晚上和星期天得到休息的。他还要向李文瑞学习英语,学基础理论。

第二年,赵建中和李文瑞同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也在那一年,两人同时晋升为工程师。

赵建中和同伴们继续改革了各种刀具,最突出的是改进了钻刀,对军事工业、对矿藏的钻探和对大庆油田的开发做出了贡献。他和李文瑞合作设计了两台多用钻床,还着手设计了大型铣床取代大龙门刨床,为万吨轮船的建造做准备工作。一九五九年,二十二岁的赵建中已被选为全国劳动模范,出席了群英会。

王胜的叙述,把大家带到解放初期的情景里去,我国工人阶级以主人翁的姿态,把旧中国机械工业的可怜的落后水平大大提高了一步。燕门机械厂的群众革新运动,就是我国机械工业发展的一个缩影。赵建中、李文瑞、陈宝元、周勇他们,都是工人阶级的先进代表人物。

大家听了赵建中的故事,都深受感动,认为的确是党把他从苦海里解救出来,是毛泽东思想哺育了他,使他成为新中国成立以后第一代青年工人中的佼佼者。

杨耀祖听了也很激动。他虽然早就知道有赵建中这么个劳动模范,但现在听大家一说,好像才第一次注意到自己这个城市里竟有这么一个杰出的青年工人。于是他点头称赞道:“小赵不仅在我们燕门是好样的,在全国来讲也是不可多得的人才,相信他到了国际讲坛上能为我国增光的。就让赵建中去讲吧!”

宋祥宁回过头来问王胜赵建中的材料送来了没有,王胜正在朝外望,忽然站了起来,嚷着说:“哦,来了,送材料的来了!”他看见了在门外的陈宝元和周勇,便赶快迎上去。大家跟着他看去,果然看见有两个人走进来,一位眉清目秀,牙齿微凸,神情稳重老练;另一位浓眉大眼,刚强机智。

宋祥宁走到两位师傅跟前,虽未见过面,却是满心欢喜地热烈地和他们握手,并高兴地接过陈师傅手中的材料。王胜立刻把陈宝元、周勇介绍给宋祥宁和两位书记以及常委们,说:“陈师傅原先是赵建中同志的开山师傅,现在是

机械厂党委副书记兼加工车间总支书记。周师傅是赵建中同志的第二个师傅,现在是总支副书记。赵建中的发明创造,他们二位一直都一块儿热情参加的。”

杨耀祖高兴地称赞说:“名师出高徒。你们辛苦啦!”

陈宝元讲着他们之所以亲自把赵建中的技术革新材料送来,是便于当面解释创造的过程。周勇还向杨耀祖简单扼要地介绍了赵建中解放前是童工、苦大仇深,又说他一直在刻苦学习毛主席的著作……

杨耀祖一面听一面不住点头,赞叹道:“‘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劳其筋骨,饿其体肤’,孟老夫子这句话,是有一定的道理的呀!”

陆文瀚谨慎地笑问道:“杨书记,你年青时不一直是工人吗,怎么还捞着念《孟子》?”

杨耀祖得意地解释说:“这句话是我听一位大理论家引用过的。”

陈宝元、周勇和这些领导人说了一阵话,便告辞出来。王胜起身把他们俩送出门外。

散会后,杨耀祖坚决邀宋祥宁、祝尚礼上他家吃饭,好好叙叙旧情。宋祥宁高兴地抬腿就跟着杨耀祖走。祝尚礼把文件带回家,转身也过杨家这边来。宋祥宁注意到老杨的住宅比起市委后花园里那座办公室来,简朴多了。他心想:“老杨究竟是老杨呀!”

这三个老战友在一块儿少不了要喝点酒。对于酒,祝尚礼是行家,不看招牌,用舌头就能分辨出八大名酒来。但是,他喝时有节制,从未喝醉过。杨耀祖酒量不大,喝一点就脸红,并且话多得要命。宋祥宁能喝,不过他轻易不多喝,那是过去做地下工作时养成的习惯。

杨耀祖喝了两杯,话匣子就打开啦。他情感激动地说:“想想四十年前,咱们在石板坊那会儿过的是什么日子啊!那一阵,哪有闲心思在一块儿喝酒?”

宋祥宁也高兴地搭腔道:“可是那一阵,我却想到我们会有今天的。”

祝尚礼吐了个烟圈,笑呵呵地赞赏说:“你们一个是革命的现实主义,一个是革命的浪漫主义,有趣!有趣!”

杨耀祖笑着摇头说:“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的味儿是怎样的我不清楚,可‘左’倾盲动主义的滋味我可尝够了!”

老宋点点头:“我听你讲过一些,你对这个深有体会。”

老杨又说:“王明路线比立三路线还‘左’。可我还是在后来‘七大’清算他们的错误时才清醒过来的。”

祝尚礼补充说：“老杨还被王明之流开除过党籍哩！那时我也在上海，不过跟康老学习写点理论文章，不致犯大错。但理论界也闹关门主义，‘左’得很！”

“你对‘左’的东西一定有免疫力了。”老宋祝愿似的望了望老杨，继续问，“你讲讲他们怎样开除你的党籍的？”

杨耀祖从丹田里吁出一口冷气，说：“老古董了，还要讲几遍？但愿我们党再也不要犯这样的错误才好！”

宋祥宁认真地说道：“这难说。”

祝尚礼觉得老杨、老宋的担忧没有根据，便不以为然地说：“难道这些年‘左’比修正主义还危险吗？你真是！”

宋祥宁不愿在这问题上展开争论，便把话题一转，挑起往事，问道：“听说老祝是你的救命恩人，是吗？”

祝尚礼鼻子喷了个烟圈，正想回答，杨耀祖抢先说：“咳，你的记忆力不行啦！我记得在石板坊那回出事后，立刻向你汇报过的。事情是这样的：那一天的支部会，我因为被工头叫住，替他做了点事，迟到了。碰巧老祝也迟到了，我从西边来，他从南边来。原来密探都已包围会址了。我没有经验，看不出来。一个密探正盘问我，老祝恰好赶到，他机灵地喝住我：‘老三，你还不回工场，老板找你了。’他一面掏出了二十元钱钞票，递给那个密探，叫他们买盒烟抽，便领着我溜走了。所以，那次支部会遭敌人暗算时，我俩没有被捕。事后，你介绍我到上海去，那儿的党组织叫我打进‘老怡和’纱厂，当上了保全工。”

宋祥宁安详地评论着：“二十块钱不少啦，够一个地下工作者生活两个月。可对密探来说，还不够他塞牙缝吧！”

祝尚礼连忙解释道：“可不，那笔钱是互济会准备送给一个同志的呢！当时为了给老杨解围，我也顾不了许多了。”他转过脸去对杨耀祖说：“我去上海不是老宋介绍的。白色恐怖太严重了，我跑回老家台州去躲了两个月，失掉了关系。后来才到上海找关系，最后找到康老那里。幸好有一位在天津时曾和我一个支部的同志也在上海，给我证明，才给我恢复关系的。”

杨耀祖有点肃然起敬地说：“怪不得你和康老那么熟，原来你们三十年代就认识。”

祝尚礼谦虚地说：“也不能说很熟，我喜欢写点理论文章，自然有时要请教他。”

宋祥宁没有打岔，只是憨厚地微笑着，听着。

一直到傍晚，宋祥宁要回北京。杨耀祖留他不住，但他认为三个老搭档今

天总还算尽欢而散,于是,便心满意足地和祝尚礼把老宋送出大门。

第二章

宋祥宁为写作班子的事,到燕门机械厂去找赵建中。他坚持一贯的做法,不愿把工人请到办公室里,而是亲自上车间去找他。他到燕门机械厂后,由陈宝元带路,往加工车间走去。陈宝元一边走,一边介绍燕门机械厂的发展和变化,对那些高大的厂房指点着:那儿是装配车间,那儿是重型车间。一提到重型车间,他就来了劲,说里头有一台二十四米的龙门刨床。讲到这座龙门刨床时,他叹了口气说:“这台龙门刨床是刚买来的,是从工业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淘汰出来的。小赵说得好:‘人家淘汰的东西,我们都拾起来当宝哩!’”

“可是,为了造大轮船、军舰,没有这大刨床怎行?”宋祥宁插问道。

陈宝元不慌不忙地说:“谁说不是呢,但龙门刨已落后啦,工业先进国都以铣代刨,好处多啦!小赵和李文瑞正设计大型铣床,为了这件事,小赵对厂部提过许多建议。他说得对呀,我们有头脑,有双手,厂里还有这么好的条件,干吗不自己动手做大型铣床,硬要花上百斤的黄金去买这台人家送上博物馆的‘宝贝’?人家从蒸汽机到电子计算机要走三百年,难道我们也要跟这条老路走三百年?小赵就是为这个挨了不少批评,还背了个‘抬杠专家’的美名。不过他不管这些,他们还在搞他们的先进的大型铣床哩!”在这位老同志面前,陈宝元简直变成一个爱说话的人了。

宋祥宁发现燕门市对赵建中这个青年工人存在着两种看法,他更觉得这个人非亲自看看不可。

进了加工车间,机器有节奏的轰鸣扑面而来,宋祥宁一听,心神顿觉爽快起来。车间高大宽敞,溜光锃亮的机床有秩序地排列着,工人们严肃地注视着机器的运转,有力的臂膊扳动着卡具。宋祥宁看着这一张一张可爱的面孔,深深地呼吸了一口机器油味儿,心里赞赏地想:“这儿有战斗性的生活气息。这儿的人是新世界的主人翁!”

他出神地看着,想着,陈宝元已把他领到钳工工段,并在一群围着一堆零件和图纸的人中找到了赵建中。经陈宝元一介绍,赵建中站起身来,他用棉纱擦了擦手,然后伸出手来握握宋祥宁的手。他小声对李文瑞打个招呼说:“过一会儿我再找你们吧。”宋祥宁和李文瑞等人一一握手。

赵建中是个二十七八岁的青年人,身材相当高,体形较瘦,但很结实。他性情敦厚,对人热忱,只要一跟他接触,就感到特别亲切。他那双乌亮的深邃

的眼睛透着机敏，直直的鼻梁和两道斜插的眉毛显现出他那有主意、能坚持的神态。宋祥宁还发现他的嘴角有时含着挑战似的微笑，致使某些人见了他这副模样也有三分敬畏。宋祥宁看过他的全部发明创造的斗争过程的材料之后，再看见他这副相貌，不禁喜欢得伸直两臂，捺着他的双肩使劲摇晃了几下。陈宝元把他俩带到车间办公室去。这个车间办公室有办公桌、有椅子，可以坐下来谈话。但这儿也很嘈杂、热闹，如果把车间比作战场的话，那么，这儿就是前线指挥所，机器隆隆声不断袭来，一时电话铃响了，一时谁又进来了。宋祥宁在这样生气勃勃的环境里感到十分惬意，精神振奋。他知道市委已向赵建中布置了出国的任务，他这次来，一则看看他，二则告诉他科技委员会已组织了一个班子——里头包括这次代表团团长顾震寰和团员中的科学家、工程师，协助他搞科学论文，现在来征求他的意见，班子设在哪儿好。陈宝元、赵建中听了十分高兴，陈宝元说：

“我们厂为这件事已组织了一个以李文瑞工程师为首的写作班子，不过明摆在那儿，我们正愁力量太单薄呢！现在，上级考虑到我们的困难，帮助我们，那真是雪中送炭了！”

赵建中高兴中有点为难。他瞪大眼睛望着师傅，仿佛在问：“师傅，那我们厂搞的班子怎么办呢？”

陈宝元了解赵建中的意思，但不好提出要求。他没来得及说话，宋祥宁马上说：“我看这样好不好，我们那几位专家合并到你们这个班子来，统一由你们厂党委来管，这对我们那几位专家、工程师来说，也是个很好的学习机会。如果你们同意的话，明天我通知他们亲自来这儿报到。”

厂党委委托陈宝元组织这次的写作班子，所以他听了高兴得连声说：“明天我亲自去接那几位老师。”他说到这儿，被一位工人叫去了。

赵建中看见问题解决得这样快、这样好，不禁咧着嘴笑。但是，这位老同志的低沉的嗓音，引起了他的一个奇怪的念头。他的双眼一秒钟也不停地打量着这位高大的老同志，久远的回忆，使他面庞突然变得阴郁、凝滞，笑容逐渐消失了。他在想：“为什么他的声音是那么熟悉？——听，那低沉的嗓音。”他坚定地相信自己的记忆，“啊，是他！不过，他不像山洞叔叔那样高大。”他心里反复想着，脑子里再现着一个一生中第一次接触到的那样亲切、那样充满信心和力量的高大的形象。但那个记忆里的人的五官是怎样的，他已模糊了，可能是年代长了，也可能那天是黄昏时候，看不清。“至于他身材的高低，那时可能是因为我岁数小，觉得他特别高大，现在我长高了，就……”

宋祥宁在陈宝元走后，和赵建中攀谈起来。但是他发现这个年青人不知

在思考什么,脸上神色不断变化,有时竟答非所问。“难道他真是个怪人?”他正在纳闷,却看见赵建中忽然站起身来,走到自己跟前,以果敢的神态冲口问道:

“你是山洞的叔叔吗?”

宋祥宁茫然不知道他说的是什么,但被年青人难以抑制的激动的脸色所感动,正想开口问他。赵建中已压抑不住在脑子里奔腾的思想波澜,冲前一步问道:

“你是二十年前,把我带到一个山洞里去看我那个受伤的父亲的那位叔叔吗?”

宋祥宁猛地站起身来,伸开双臂,把赵建中搂到胸前,用激动得发颤的声音叫了声:“生儿!”

赵建中接受这种突如其来的、但又是渴望了很久的爱抚,像掉在蜜糖罐,淹没在蜜汁里快被窒息似的,呼吸都短促了。他的头紧紧地靠在他的肩上。宋祥宁因感情激动,眼睛、鼻子都挤到他那宽厚的脸盘的中央了。踏着多少烈士鲜血染红的道路走过来的二十年啊!

加工车间成千上百的机床的轰鸣所组成的大合唱,立刻为这两代人的重逢唱着赞歌。他俩从上一次的见面到这次的重逢整整经过了二十年。而这二十年,祖国正以雄伟的步伐跨过了两个时代,跨过了两个截然不同的社会啊!这一老一少紧紧搂抱了一阵,然后才松开手,相对打量着,笑了。这一笑,包含了多少内容哟。首先,它表达了我们这个社会的巨大的变化:一个消灭了剥削制度的崭新的国家在东方诞生了。那个苦难的童工,像亿万个不幸的中国少年儿童那样,已成为国家的主人。他和成千上百的工人阶级的优秀代表那样,已为社会主义祖国工业建设做出了优异贡献。而那一个呢——铁匠出身的老共产党员,他在革命的征途上看见不少战友在刑场上慷慨就义,在战场上英勇牺牲。他的大半生,却像在巨浪的颠簸中生活。他没有料想到的是,这个优秀工人,竟是已牺牲的老战友的儿子——这个七岁的,瘦得像条枯藤似的小家伙,在党的哺育下已茁壮成长起来……

陈宝元办完事赶快回来陪客人。可是他一踏进屋,却被奇异的景象吸引住了,他看见这两个人抱得那么结实,恐怕五十马力的电动机也未必能把他们拉开。究竟他走后这十几分钟内发生了什么?后来他又看见这两个人笑得那样欢乐和激动,没敢惊扰他们,就呆呆地站在门口。等俩人的情绪稍微平静一些,彼此坐下来以后,他才走上前去。宋祥宁看见陈宝元脸上又是欢喜,又是有疑问的神色,知道他不明白内情,就赶快把下面的故事告诉他。

一九四四年的暮春，赵建中（那时他还没有大名，小名叫“生儿”）只有七岁。有一天，他坐在山脚下等他的父亲回来。他母亲擦着眼泪出来，伸着脖颈瞪大眼睛往远处张望，如果没有五十次的话，起码也有四十次了。她听说，矿山的鬼子今早又毙了好几十个“共产党”。他爹到现在还没有回家，母子俩焦灼地盼呀盼呀，妈妈眯着被泪水糊住了的眼睛，不时地问：“生儿，是那群人中的第三个吗？”“生儿，是扛了杆小木棍的那个吧？”

“不——是。”生儿用失望的口气回答。

生儿记得，有一次夜里，听爹对妈说共产党好，他想跟共产党的八路军走，问妈能不能领着孩子们过日子。后来他只听见妈哭，没听见爹再说什么。

“备不住我爹就是共产党，给鬼子毙了？”想到这儿他的手紧紧捏成两个小拳头。山坳里的北风像尖刀子似的透过他的薄薄的小棉袄从他的小脊梁上掠过，可是他的小胸膛里却是热乎乎的。这时，他真想见他的爹呀。他想到五里以外的矿上去打听消息，可是妈不让他去，只许他站在离茅屋不远的这块大石头上。望呀望呀，哪有他爹的影子呢？他的小小的脑袋里七上八落地想这想那，一时幻想着有几个叔叔抬着他爹回来了，一时又幻想着他爹提了两个鬼子的脑袋往万人坑里一掼，对着累累死尸高声喊着：“哥儿们，共产党替你们报仇了！”他正泡在这种幻想的兴奋中的时候，他的瘦削的左肩上冷不防给人捺了一下，他猛回头一看，一个大高个的叔叔和气地望着他，笑着问道：

“生儿，想见你爹吗？”

他机灵地打量着那个人，将信将疑地问道：

“你知道他在哪里？”

那人不答，只用低沉的嗓音和准确的口气说：“把能吃的东西都带上，把你爹的棉袄带上。”他用手指戳点着他的高高的宽阔前额说：“第一，不能对任何人说，对你妈也暂时不说，要是说出去，你爹就没命了；第二，要快，我在那棵柳树下等你。”他往不远的那棵树指了指。这时已是黄昏时候，他一转身就不见了。生儿回家，恰好妈妈领着妹妹到隔壁去了，他从炕席底下抽出父亲的旧棉袄，又用手巾包上了饭锅里还有点温乎气的仅有的四个窝头，转身就溜出门外。这全部事情他只用了五六分钟工夫便已做完，走到柳树下了。嗯，树下空无一人，那个高大的叔叔并没有在柳树下等他呀。他正疑心地四下张望，便听到草丛里沙沙地响，那低沉的声音又在命令他了。

“快跟我来。”一个高大的身影已站起来。

这时天已黑下来，生儿奔那个人影，紧跟着他在灌木丛里走了好长好长一段路，后来转到一个小山洞跟前站住了。那叔叔领生儿进去。

“生儿！”他爹用那显然是乏力的、却又是振奋的声音呼唤他。这一呼唤，使生儿全部神经都兴奋起来，好像世界上就数这声音对我是最需要的。他朝这声音扑过去，一只手臂接着他。那高大的叔叔划了根洋火，生儿才看见父亲面色惨白，左臂缠着绷带。原来爹是被鬼子枪毙的二十四人中的一个，但是他没有死，夜里从万人坑里爬了出来，被党的地下工作者救了。

生儿哭了，可是他挺着小胸膛说：

“爹，你可得活下去呀，你还要杀鬼子报仇哩！你投奔八路军去吧。妈给矿山的叔叔补衣服，我砍柴火做饭，带小妹妹。”

在黑暗里，那高大的叔叔摸着他的脑袋夸赞说：“有主意，有志气呀！敌人的残暴教育了我们的后代呀！”

父亲紧紧地搂抱着儿子的头，在茫茫的黑暗中只有一片沉默……

“生儿呀，有一件事我得告诉你。”那个受伤的年青的父亲说，“我本姓李，不姓赵，我原住在石板坊，后来才来矿山的。我十四岁那年，有一天，我的师傅孙益善要开秘密会议，叫我放哨。不多一会儿，我发现有一批衣衫古怪的人——秘密警察，好像要包围秘密地点。有一个人鬼鬼祟祟地对秘密警察使眼色。这了不得，我没等秘密警察过来，扔石子把会议地点的玻璃窗打破（为了执行任务，我练习扔石子扔过好长时间，简直百发百中）。一个秘密警察过来赶我，当然没有追着。事后听说开会的人全体被捕了，只逃出来两个人，其中一个就是叛徒。”

“哦？”在黑暗里，那个高大的地下工作者用他那低沉的声音惊疑地喊了一声，忙着划了一根火柴，急切地好像要借火光来考察一下受伤的矿工所说的话的准确性似的。他又用他那低沉的嗓音向受伤的矿工问了许多话。

这时火柴早已熄灭，受伤的矿工继续说：“后来，我师傅他们牺牲了。魏师傅给了我五块大洋，劝我换个地方。我逃到上海去，到了上海纺纱厂干活。我在纱厂又碰上石板坊机器厂的杨师傅。我就跟着他闹革命了。谁知道后来说我犯了个大错误，又把我赶出上海。我才逃到这矿山来的。从此我就改姓埋名了。幸好在这儿我又找到了党……”

一直抬起头来听他讲话的小儿子，这时又紧抱着父亲，惊喜地、稚气地问道：“爹，那你是不是共产党？”

父亲用右臂使劲搂了搂小儿子，作为回答。他的伤痛加剧了。他顿了顿，向地下工作者提出要求道：“同志，一定要追查那个叛徒，不能让他藏在党内呀……”

那个高大的人严厉地问他道：“你在上海犯错误那一段从未对党讲过，为